

李斯集

(征求意见稿)

河南人

版社

李 斯 集

开封高压阀门厂工人理论组
中共上蔡县委宣传部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

（征求意见稿）

河南人民出版社

编 注 说 明

一、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教导，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将李斯的著述辑录起来，加以注释，定名为《李斯集》，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时参考，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二、本书中的原文主要是根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清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近人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等编选而成。因我们查阅的资料有限，今存的李斯著述，可能还有遗漏，恳切希望同志们提出增补意见。

三、为了有利于全面系统地研究李斯的思想 and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将李斯的著述（包括他的片断的言

论)共二十七篇作为正文收入本书。秦王朝的金石、诏版、虎符文字共十一篇，亦当为李斯撰稿书写，我们把它作为附录，放在正文后面。正文和附录都按时间顺序排列。

四、本书各篇，编选时对原文作了校勘，题目除《谏逐客书》是沿用古人的以外，其余全是我们加的。凡未注明出处的，都是选自《史记·李斯列传》。

五、本书正文各篇，都加了说明、注释和译文。注释力求通俗易懂，不繁征博引。难懂的句子，注了大意。观点错误的作了批判。译文以直译为主，但为了通俗地表达其实际意思，又不拘泥于直译。

六、本书是由开封高压阀门厂、中共上蔡县委宣传部、开封师院中文系的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组成的三结合注释小组注释的。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够，水平不高，编注工作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前 言

李斯(约公元前二八〇年——公元前二〇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出身“闾巷布衣”，曾作“郡小吏”。他年轻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史记·李斯列传》)，与韩非同学，深受法家思想的熏陶。公元前二四七年西入秦国，先后被秦始皇任以长史、廷尉、左丞相等职。他在秦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积极辅佐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统一中国，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为新兴地主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公元前二一〇年，当奴隶主复辟派头子赵高乘秦始皇巡游中突然病故之机，勾结胡亥，阴谋发动宫廷政变，篡权复辟时，李斯却为了私利，屈从赵高，为他们所利用，最后于公元前二〇八年惨遭杀害。

李斯的一生，经历了从战国末年秦并六国到秦朝灭亡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一定有过不少著述。但是，在历史上长期的尊儒反法逆流里，

李斯一直是儒家反动派攻击的对象,也没有人将他的著述编辑成书,至今,大部分都已散失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李斯著述(包括李斯的言论)的幸存部分。因此,我们本着求全的精神,不拘这些著述体裁的差异和篇幅长短,把它辑录起来,加以注解,定名为《李斯集》,供广大工农兵群众研究和总结秦朝统一前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参考,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本书辑录的李斯著述,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秦王朝建立以前的著述,主要反映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活动;二、秦王朝建立到沙丘政变之前的著述,主要反映了秦王朝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三、沙丘政变及以后的著述,反映了李斯对待沙丘政变的态度及以后力图恢复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活动。秦时的刻石文字,“其辞亦李斯所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现作为附录,一并收入本书。

李斯能够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事业,根本原因是什么?从李斯的著述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活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分裂割据，渴望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并执行了一条法家路线的结果。

战国末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出现了由封建割据的诸侯王国走向封建统一的总趋势。在全国范围内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实现封建统一，是历史赋予新兴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却不是任何诸侯国都可以完成的。战国七雄中，由于各国社会变革程度不同，统治者执行的路线有别，因而，力量对比大相悬殊。正如李斯指出的，与关东六国相比，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到秦始皇时，秦“乘胜役诸侯”，已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当时，“诸侯服秦，譬若郡县”，谁也无能与秦抗衡，秦并六国，已成“灶上骚除”之势。这就说明统一中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秦国地主阶级肩上。李斯毫不含糊地拥护秦国统一事业，而且以实际行动参加这场斗争，表现了鲜明的地主阶级法家立场。他入秦后，建议秦始皇抓紧时机，“灭诸侯，成帝业，为

天下一统”，这对秦始皇确定和推行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有重要影响的。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一定的组织路线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李斯不但帮助秦始皇制定和执行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还帮助秦始皇坚持一条“任人唯贤”的法家组织路线。

当秦始皇粉碎吕不韦、嫪毐叛乱集团之后，为了进一步肃清吕不韦招募的六国儒生，下了“逐客令”。秦始皇“逐客”是有鲜明的阶级内容的，这是为了保证法家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而采取的正确行动。但是，秦国的“宗室大臣”却叫嚷“一切逐客”，妄图乘机把全部法家宾客赶出秦国，实现其改变法家政治路线，破坏准备中的统一战争，最终复辟奴隶制的罪恶目的。面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刮起的“排法”妖风，李斯挺身而出，给秦始皇上了《谏逐客书》，揭露奴隶主贵族“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阴谋。他指出“一切逐客”的结果只能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这当然不利于“跨海内制诸侯”的统一事业。而且，“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这种作法，“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必将危害秦国地主阶级政权的生存。因此，他建议秦始皇为统一事业广泛罗致人材，大胆任用忠于

统一事业的法家。李斯的上书戳穿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阴谋，秦始皇立即取消“逐客令”，并提拔李斯等法家到中央，组成一个坚强的法家领导核心，为统一战争做了组织准备。

作为政治家的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军事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协助秦始皇正确部署秦国兵力，坚持孝公以来行之有效的“远交近攻”、“蚕食而尽”的战争策略。与此同时，李斯又设计“阴遣谋士”，“游说诸侯”，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经过十年兼并战争，“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完成了“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统一大业。

斯大林说：“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秦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分裂战乱的历史，为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和可能，使地主阶级专政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下来，这是我国历史的一个进步。由于战争直接打击了六国贵族，摧毁了与奴隶主复辟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诸侯国家机器，这对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制复辟，是非常重要的。况且，秦

并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大一统的局面,为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点,直到今天仍有其光辉的现实意义。

二

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取得了全国政权,但并不意味着复辟反复辟斗争的结束。从李斯在秦王朝建立后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公元前二二一年,即秦王朝建立的当年,丞相王绾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鼓吹在齐、燕、楚等地“置王”,“请立诸子”,妄图复辟倒退。朝廷之上,群臣附和,“皆以为便”(《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时间,要求分封制的妖风骤然卷起。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恢复分封制,是关系到秦朝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问题。分封制是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它和等级制度、世袭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奴隶主阶级层层统治和世代剥削奴隶的制度。随着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的胜利,奴隶制的分封制已经成了地主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分封制已被统一战争扫进坟墓的时候,王绾一伙公然要把这个历史亡灵请出来,

反映了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复辟奴隶制的愿望。李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对王绾等人的反动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用历史上实行分封造成的“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的教训驳斥王绾，斩钉截铁地说：“置诸侯不便。”（《议行郡县》）这个“不便”，就是不便于地主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否决王绾的主张，“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直接由中央派员治理，使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后确立下来。这场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斗争，说明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时刻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

王绾等人的复辟阴谋被挫败后，奴隶主阶级继续变换手法，进行复辟活动，一批混入秦王朝的反动儒生便充当了他们的代表。这批孔孟之徒利用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阵地，打着“私学”的幌子，到处制造反革命舆论，攻击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和政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议焚书》），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公元前二一三年，反动儒生淳于越再次挑起论战，于宫廷宴会上公然叫嚷“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威胁秦始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

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颂古非今，鼓吹倒退。李斯当场揭露了他们一伙“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议焚书》）的复辟阴谋；并建议秦始皇采取“焚书”措施，将“《诗》、《书》、百家语”这些儒家破烂，付之一炬。第二年，秦始皇又将有严重反革命罪行的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坑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严厉镇压反革命。“焚书坑儒”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革命专政，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行郡县和“焚书坑儒”这两次重大斗争，都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深刻革命。“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因此，历史上所有革命阶级都是以夺取政权为自己革命斗争的首要目标，在夺取政权之后，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旧的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主动地改革上层建筑，以巩固地建立本阶级的经济基础。而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也总是以颠覆新政权，并竭力反对上层

建筑中的一切改革，为复辟旧的经济基础开辟道路。所以，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必然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突出地表现出来。秦王朝建立后，从王绾一伙到那批被坑的反动儒生，无论他们提出恢复腐朽的旧制度，或是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制造反动舆论，其最终目的都是要破坏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全面复辟奴隶制。这就告诉我们，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反复辟斗争。

三

李斯的著述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高、胡亥篡权复辟的经过。正确认识这个复辟事件，可以吸取必要的历史教训。

首先，应当看到，赵高、胡亥的篡权复辟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的。秦王朝建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新政权措施，但是，由于这是一次剥削阶级革命，所以，它既不可能彻底镇压反革命，也不可能各个领域根除奴隶制的残余。因此，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并没有被消灭，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

个领域里，它还有着相当的力量和影响。譬如：经济领域里，还保留着工商奴隶主所有制，甚至一些工商奴隶主“富至巨万”，“礼抗万乘”，“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史记·货殖列传》）。这样，奴隶主商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奴隶制的经济基础，破坏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并腐蚀封建制的上层建筑部门，从中寻找代理人。在政治上，六国贵族和奴隶主阶级的残渣余孽仍“散处闾巷之间”（章太炎：《秦政记》），伺机“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还有的甚至打入秦王朝各级政权机构，深深地埋下了定时炸弹，赵高就是这样的危险人物。思想文化领域里，孔孟之道并没有受到彻底批判，仍然是奴隶主阶级进行复辟的思想武器，秦中央一直养着七十多名儒生（博士），“优游论著”（章太炎：《秦献记》），就很能说明这方面的情况。所有这些，便构成了奴隶主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不但老的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会利用这些条件，时刻图谋卷土重来，而且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奴隶主分子。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勾结起来，一哄而起，颠覆新政权，复辟奴隶制。赵高、胡亥的篡权复辟，就是新老奴隶主复辟势力一次丑恶的表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剥削阶级的革命，在取得政权后也必须

继续清除旧制度的基地。不然的话，新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反动阶级的复辟将会随时发生。恰恰在这一点上，秦王朝的统治者，包括李斯这样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由于剥削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看清楚，更不可能做到。这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们还应当看到，作为这次反革命政变主谋的赵高是以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进行活动的。赵高是赵国旧贵族后裔，“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赵翼：《陔余丛考》），混入秦宫当上一名宦官。他披着法家外衣，冒充“通于狱法”（《史记·蒙恬列传》），伪装拥护秦始皇，以韬晦之术掩盖了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地主阶级毕竟是第一次掌握全国政权，还缺乏同暗藏的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这样就使赵高能够钻进秦王朝心脏，隐藏下来，并且骗得秦始皇的信任，窃取了中车府令兼管皇帝符玺的职务，当了胡亥的“教习”。一个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竟然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赵高利用打进秦朝中央的有利地位，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拉拢腐蚀胡亥就是他十分阴险的一招。秦王朝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击败了王綰、淳于越这样一些气势汹汹、公开表演的敌人，却没有能防止赵高这样暗

藏的敌人从内部的进攻，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此，革命阶级必须十分注意识别和揭露阶级敌人的两面派活动，严防他们篡夺各级政权，不然的话，就会招致丧权亡国的危险。

第三，在赵高、胡亥的篡权事件中，李斯是个关键人物。他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政治影响抵制并粉碎这次篡权阴谋，但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屈从赵高，作了赵高篡权活动的工具。李斯屈从于赵高决非偶然，这是他私心重、骨头软造成的必然结果。当他早年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时，就曾发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论得时无怠》）的感慨；当他受到秦始皇的重用，获得一定地位时，就妒贤嫉能，不仅不去团结韩非，一道辅佐秦王完成统一事业，反而加以陷害；当他被擢升为丞相，“子孙皆至尊位重禄”时，又发出“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物极则衰》）的慨叹，唯恐失去了“富贵极矣”的地位。随着李斯政治地位的变化，地主阶级保守性的一面恶性膨胀起来，障碍了他的政治视野，使他逐渐丧失早先那种敢革命、敢斗争，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沙丘政变时，赵高正是抓住李斯这个弱点，威胁利诱，软硬兼施，逼他屈服。李斯为了保官保命就屈从赵高，使自己成了赵高、胡亥篡

权活动的工具。沙丘政变后，赵高操纵胡亥，猖狂地进行复辟活动。严峻的现实使他对赵高的复辟派面目逐渐有了认识，也起来揭露赵高的“邪佚之志，危反之行”（《上书秦二世言赵高》），劝二世行“督责之术”以夺回旁落的大权。但是，只向奴隶主复辟派赵高手中的傀儡胡亥“上书”，能有什么作用呢？李斯的悲剧清楚地表明，剥削阶级的革命性是有限度的。作为一个阶级是这样，作为阶级的个人，也必然是这样。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研究李斯的著述，总结秦王朝统一前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经验，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一个新的剥削制度的建立尚且如此，无产阶级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历更加艰难曲折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准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产阶级作战，实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尤其要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